

# 唐廷枢与开平煤矿资金问题

· 史 泽

中国早期工业化往往面临着一个不发达经济或前现代化经济的典型问题——即因为资金相对不足和借款成本昂贵(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短期商业贷款年利率为10—25%)，致使长期投资筹集资金困难重重。①这个难题成为开平煤矿经营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近代化大型煤矿投资特点是：投资规模大，风险大；成本收回时间较长。因此，开平煤矿依靠昂贵的不稳定的借贷资本和官方垫款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藉以解决开平煤矿资金困难。唐廷枢认为资本的筹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运输条件的完善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既不能因为资金的不足而贸然增加借款，超出企业负债能力，导致企业丧失活力，也不能因为资金相对短缺、运输的不便而使企业生产停滞不前。他为了吸引私人投资，一方面凭借自己积累的巨额资本认购开平股票，以开投资之风气；另一方面依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利润的增长招集私人投资，成功地解决了开平煤矿资金困难，为开平煤矿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出现投资工矿热潮。此时“上海股分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②。1883年1月《字林沪报》指出：“自春徂冬，凡开矿公司如长乐、鹤峰、池州、金州、荆门、承德、徐州等处，一经稟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③工矿企业通过发售股票的途径在上海集腋私人资本，在当时被看成社会“时尚”。当时，《申报》评论说：“华人近来亦知此事(认股)之大有裨益，且不仅投股而已，又以股票相互买卖者，其行情时有涨跌。”上海股票市场十分活跃，各工矿发放的股票升水明显上涨，“查招商局原价每股一百两，今则已涨至二百五十两矣；平泉铜矿原价一百两，今已涨至一百六十两矣；开平煤矿原价一百两，今已涨至二百三十七两五钱矣，……”。④当时投资矿务的热潮，为开平煤矿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唐廷枢抓住这次投资工矿热潮提供的机遇，积极为开平煤矿筹集私人投资。

当时中国商民认购股票存在着盲目性，他们认购股票不以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的高下作为投资的依据，而是“以经事之人、之声、之身为断，以某也大员，某也富户，其创办某矿先有己之资本在内……”⑤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唐廷枢利用商民投资工矿业经验不足的弱点，凭借自己拥有的巨额资本和商界的影响，率先投资开平煤矿，起到了开风气作用，加快了开平煤矿集资进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没有形成合理统一的投资市场(如股票、证券市场)，旧有的财富拥有者(如盐商、钱庄主、地主、官绅等)期望自己的资金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不愿把资金投向风险大而所得利润又明显低于传统商业(如钱庄、典

当、盐行等行业)的新式工矿业。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要创办一个大型煤矿,创办人必须是一个资金的提供者,“他们不仅自己在近代企业中投资,而且还用各种新方法筹集大笔的资金,这些资金正是近代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须臾不可离的。”⑥唐廷枢正是上海商界巨子,他凭借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在调动社会资金上不但能够对“诡寄洋行”的“殷富”发生号召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中国一般商人对新式企业寄予热望,提供资金。

唐廷枢从洋行买办到创办民族工业的转变过程中,他和他的家族成员进行跨行业的连锁投资和经营,在当时商界声望很高。他于1858年在香港经营了两家获利丰厚的当铺。⑦1866年从怡和洋行得到10万两贷款,在上海与人合开了一家当铺,年获利40%。⑧他在充当怡和洋行总买办时,曾经是“泰和”、“泰兴”、“精益”三家钱店的老板。1872年唐廷枢在创建轮船招商局的同时,与徐润集股100万两,创立仁济和保险公司。⑨在旧的银钱业和近代保险业的投资和经营中,唐廷枢积累了巨额资本,他在涉足于金融业的同时,对旧式和新式的工业和商业也进行了多方面投资和经营。在怡和洋行协助下,1869年唐廷枢成为一个中国政府批准的盐商;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在汉口开了原生祥茶栈,在上海开了恒宏顺茶栈。⑩在新式工商业投资和经营中,唐廷枢首先投资于航运业。“北清”、“华海”、“公正”三家公司是唐廷枢资本角逐的主要场所⑪。唐廷枢还与他的家族成员分别投资于烟台纺丝局、中国玻璃公司和上海电光公司⑫。这一系列投资和经营活动,唐廷枢“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积累了可观的资本”。他是一位集资本的消极拥有者角色和积极经营者角色于一身的富人,这使他区别于传统的把资本管理交给社会地位较低的管家去办而自己过着清闲逍遥的绅士生活的富人,因此,他才有投资于近代工矿业的可能。

可以说开平煤矿集股的成功与唐廷枢过去的工商活动以及所积累的资本有直接关系。开平煤矿原计划集股80万两,1878年实际招股22万两,主要投资者是唐廷枢。到1881年开平煤矿已开销70万两,其中唐廷枢个人私垫多达40万两。直到1881年秋,开平煤矿投产后,才迅速筹集到120万两。在120万两股金中,唐廷枢个人认股30万两⑬,其余不少股份是唐廷枢“因友及友辗转邀集”而成。45万两私人借款也是唐廷枢凭借自己在商界威望四处称贷而来。我们可以说唐廷枢是开平煤矿初创时期资本的主要承担者,他这种承负能力显然是以他所积累资本数量及其在商界的影晌为基础的。

象唐廷枢这样“独肩艰巨”的认股和私垫巨资是以他自己及其家族的事业为冒险代价的,这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是不多见的。时人评述说:唐廷枢“于开平矿局非独一无二毫无私利之见存于胸中,且不借毁家以成就其事,其高谊尤为人所难能”⑭。唐廷枢为什么这样做呢?首先,他是一个深刻了解西方的买办,在“中西通市交涉日繁”的历史潮流中,他认为“男儿当学有用之学,沾沾章句无益国家事”,“遂弃举子业,习泰西学”。他“更穷心于商务,于利害得失,瞭然如指诸掌”⑮。二十多年的商务实践,使他深深察觉到近代工矿业的前途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给投资者带来的长远而丰厚的利润。由于唐廷枢拥有巨额资本并认识到近代工矿业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其它阶级(如官僚、士绅、地主、旧式商人等)产生投资近代工矿业意图之前,他就愿意投资于这样的企业。其次,唐廷枢是一年寄食于外国洋行的买办,依靠洋人的残羹剩汁积累自己的资本,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多,不愿依附外国的侵略势力,希望通过发展民族工矿业使自己成为独立的资本拥有者和经营者。再次,唐廷枢投资于官方支持和保护的“官督商办”企业,能够利用“官”的庇护进一步得到投资利润,他所拥有的财富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这些因素成为唐廷枢投资工矿业的内在动力。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煤炭市场供不应求。外国轮船到中国口岸次数不断增多,需煤量也在

增长，而外国轮船所消耗的煤炭都是从本国载运而来，直到80年代初，“各国轮船在中国添装之煤，仍系洋煤之预运者，复以售之”<sup>⑩</sup>。19世纪60、70年代以后，通商口岸外资经营工厂的用煤量也有明显增长。6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军工企业，70年代初创设的轮船招商局，80年代末建成的华北铁路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都迫切需要煤炭。社会对煤炭需求量的增大为开平煤矿创建提供有利条件。开平煤矿创办之初，唐廷枢就深深感到“煤铁乃富强根基，亟宜开采”<sup>⑪</sup>。他认为“煤铁乃军民日需之件”，“夫取天地之利，济民生日用之需，寰中之宝藏已兴，海外之漏卮渐塞，试属富强要求，远大宏猷”<sup>⑫</sup>。因为他深刻认识到煤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能够把巨额资本投股于开平煤矿。

唐廷枢起初招集商股是不成功的，“当时风气未开，国人无投资习惯，且开平又属创办，成败难必，故对招商集股，多裹足不前……而唐氏终不灰心，将一切希望寄于将来出煤运销”<sup>⑬</sup>。当时有些矿局在技术、管理等问题还没有把握之前，便到上海招商集股，随后因为矿局进展缓慢，股票贬值，“矿中寂无消息，举办无期，有股者疑虑百端，争相贬价，忽而大跌”<sup>⑭</sup>。唐廷枢在招商问题上没有采取其它矿局惯用的“瞒天过海”之术，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为了开平煤矿有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渠道，他把开平煤矿的创建、施工、生产、运销等情况迅速地见诸于报端，公布于众，以开平煤矿在解决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成功来坚定投资者对开平煤矿的信心。此举真可为“事事登报悬为成例”。

早在1879年，开平煤矿初创阶段，《申报》报道了唐廷枢勘探情况：“十二月十五日抵天津，二十六日观察（唐廷枢）委弟（柴维振）前往开平先行布置一切。于六月二十日观察偕洋人矿司等抵开平，二十二、三、四连日往勘煤铁各矿，二十五日开局名曰：开平矿务局。二十六、七、八、九复往各矿勘煤铁成色，查得开平镇之西二十里乔家屯地方数处，所产之煤比别矿更高”<sup>⑮</sup>。1880年开平煤矿的投产计划在《关册》中也有反映：“开平煤矿的工作正在大力推进中，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希望在1881年年底以前，能供应天津市场以相当数量的煤斤”<sup>⑯</sup>。与此同时，《申报》还介绍了开平煤矿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情况：“英京开来一火船，于前日进口，其中有管理开平煤矿之机器人四名，闻唐观察景星所聘订”<sup>⑰</sup>。这些消息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开平煤矿创建情况，能够使投资者摸清开平煤矿创建进展的底部。1880年到1881年初是开平煤矿资金最紧张时期，唐廷枢利用《申报》连续报道开平煤矿的建筑规模和生产情况，以此来拓宽开平煤矿集资的渠道，详细记述了开平煤矿开办规模、煤井、机器设备等情况，着重描述了机器的工作效率，“厂内开二井，一提煤，拟六十丈，其机器每日能提百万斤；一提水贯风，拟六十丈，每分时辰可抽水千斤”<sup>⑱</sup>。该报还对开平煤矿的煤质、创建、投产等方面进行评述。开平煤质“坚硬”，“其色泽润，试烧火势极旺。以欧美各国钻地开井，往往年分阅五六年之久，资本经百余万之多。今开平煤矿系光绪三年招商，次年钻地，去今两年开井，仅及三年，煤槽已见。此事半功倍之举，而又能经费从省者，可为股人贺，亦可为唐观察贺缘”<sup>⑲</sup>。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报纸连续报道不仅把开平煤矿所取得的成就展现给广大商董，增强他们信心，而且也赞扬了唐廷枢对开平煤矿所作出的贡献，“初创时，人皆视作畏途，既办后，人又惴生疑窦。独观察力任其难，小心竞业，人言不恤，告厥成功”<sup>⑳</sup>。这样，投资者对开平煤矿有了较全面真实了解，坚定了他们信念，稳定了开平股票市价，拓宽了吸收资金来源，为开平煤矿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 二

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出现的投资近代工矿业热潮，对开平煤矿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是，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形成统一的稳定的股票市场，新旧金融机构并存，并且上海华商的商业在开关以后依然依靠底本不厚的钱庄放款周转，因此上海工商业依靠脆弱的旧金融机构作为信贷机构，给当时工商业活动带来不少弊端，也给投机商留下可乘之机。上海商人一向有买空卖空的习惯，常常利用银两和银元兑换率的差值和两种货币存借利息的差值，做所谓的“吊盘空盘”的生意，再加上一些矿务局派到上海的人和本地的一些商人以及钱庄合伙利用投资工矿的热潮，做股票投机生意，成为导致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另外，外商利用他们和钱庄的密切关系，暗中操纵也加重了上海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工矿业投资市场受到致命打击。“1883年秋冬之交，上海市场上产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使一度在80年代初十分活跃的海股票市场一蹶不振。一直到80年代末，在煤矿工业方面除了在1887年出现了一个官办的小煤矿——山东淄川煤矿以外，就不会再见到其他新矿的出现。”<sup>②7</sup>80年代中后期开矿投股活动陷于停顿，上海的投资市场出现疲软，“近年以来中国之谈矿务者日益众，东开一矿，西开一山；至于矿务股分之票，彼此买卖成为市面，其势可谓盛极矣。然不务乎实而傲乎名，间又有指东话西并无把握者，遂至一败涂地，因此而丧资破家者不知凡几，于前明之祸无异，迄今谈者犹为色变”<sup>②8</sup>。这无疑给生产、运销日益兴旺的开平煤矿的发展带来困难。

1883年上海的股票和钱庄风潮使开平股票市价急剧下跌，一直到80年代末，开平煤矿的股价回升不快。人们对开矿投资失去了兴趣，不愿投资于风险较大的矿产业。当时《申报》指出：“迩来办理矿务不特利，不能兴，而且害贻，胡底言开矿者盖几几相引为戒矣”<sup>②9</sup>。8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对开矿热情不高，开平煤矿的兴旺发展也不能扭转投资市场的萧条局面。“虽有数处经理得法，矿苗果然上等，通风泄水，一切机器无不合宜。而经事人又复实事求是，又不以他人之资本轻于一掷，自此八年十年，利可以日见兴旺。然以各股分有跌无涨，买股之人争思脱手，市面银根紧急异常，耳不暇及，何矿之佳而转为购进？故如开平之煤矿亦有成效，出煤多而且好者，无人探悉其现在情形，股分之票价虽略有胜，而不满于原股之数，亦未必舍他矿而就此。”<sup>③0</sup>1883年9月2日起开平股票市价每股下跌原价100两以下后，股价有跌无回，一跌再跌，最低时每股市价30两左右，给开平煤矿发展造成了严重困难。

在这次风潮初期，唐廷枢试图凭借个人的资金大量购进开平股票以维持开平股票市价。一开始，这样的努力略有收效，但后来力不能抵。1883年8月怡和洋行上海经理在一封信里谈到，“我相信他（唐廷枢）有开平股票三千股，抵押在钱庄里来借巨款。六个月到八个月前，他在市场上买（开平）股票，中国人马上跟着买，结果一时市价坚挺而高昂。前几天他从英国打电报来，要买（开平）股票稳定市场，有人替他以每股一百二十两购进五百股左右。但是中国人不但不跟着买，反而最后愿意以一百一十五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sup>③1</sup>。这一年8月至10月间，开平票价涨跌无常，到10月间开平股票每股跌至80两<sup>③2</sup>。唐廷枢维持开平股票市价的努力收效甚微，无济大局。开平煤矿的资金周转日趋紧张，严重威胁到企业的发展，“现在出煤虽日渐畅旺，而所售之值，除开销局中公费外，所余有限，贷款利息与股中官利，均属不敷开支。且其中贷款，尚有不能延缓者，捉襟露肘，时有所虞”<sup>③3</sup>。

唐廷枢要摆脱严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面临着以下几种选择：一是借贷官款以度难关。如果开平煤矿大量借贷官款以助企业的发展，这个以民间投资为主的“买办”商人自己承办的近代化大型矿山的性质，就会向官僚资本主义方向偏转，企业千辛万苦争来的一些自主权有可能被夺去，这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十分不利。二是向洋行贷

款。在当时传闻四起，传说开平矿局要归怡和办理，“开平煤矿今春新泰同相助为理在天津销煤斤，而与全矿事宜并不干涉。前月怡和行东茄臣因该矿事务屡次来往京津，目下西人互相传述，谓该矿将归怡和办理云”<sup>③④</sup>。外国人对蒸蒸日上的开平煤矿早有并吞之心，“开平矿务局有归怡和洋行经办之说，盖因该局款项拮据，向怡和贷银三十万两也”<sup>③⑤</sup>。西商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又不允许酌议，唐廷枢在认真考虑后，认为“不欲为三十万两之故，将全矿归人掌握，如不通融酌议，拟将前说为罢论”。以上两种选择对矿局发展害大于利。最后一种选择，就是依靠企业自己的力量解决资金困难。

从1883年到1886年上海开平股价仍在30两至60两之间徘徊，使它尽快回升希望不大。开平煤矿要从私人投资者手中再得到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看来十分困难。唐廷枢面对这一局面，采取了积极补救措施。一方面坚持生产、扩大销售，靠企业自身能力来解决周转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适度借贷官款减缓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资金周转上的压力。

首先，唐廷枢以扩大生产、增加销售来获得企业周转资金。从1883年到1888年，开平煤矿年产量由109,090吨增至246,699吨<sup>③⑥</sup>。日产量也不断提高，1883年年底日产量在600吨左右，到1884年7月“日产量维持在900吨以上”<sup>③⑦</sup>。投产后的前三年煤斤销售金额达320,000两，用来补添煤矿生产开支。与此同时，唐廷枢采取应急措施，从1883年起提存公积金，从销煤所得，陆续清偿所借官私各款，停发初创几年内的股息，这虽然有违招商初衷，但是对集中款项偿还官款和私款，减轻危机时期开平煤矿所负担的沉重息银来说是一项有效措施。

其次，唐廷枢以开平煤矿取得天津煤斤市场的胜利来巩固天津的开平股票市价。起初开平煤矿以争夺天津市场为主要目标与日本煤展开竞争，1883年洋煤减至3,400余吨，1884年减至1,200余吨，1885年减至560余吨，1886年减至301吨<sup>③⑧</sup>。开平煤矿逐步取代洋煤，并利用天津的出海口，向其它口岸转运。开平煤在天津市场取得巨大胜利，稳定了天津金融市场上的开平股票市价，并使之有所回升。1883年10月上海金融危机开始之际，《字林西报》刊载来自天津的消息：“开平煤矿股分忽又涨至90两，购者争先恐后。向其所以涨价之故，或则云因今年所开之第五矿口出煤之多；或云徐润之观察至津与李傅相商协妥贴，其开平东北尚有铁矿，亦许其开取并入开平，故闻此信息者莫不纷纷向买也”<sup>④①</sup>。时隔几日，天津的开平股票市价每股超出100两，有明显回升，“（天津来电）又言开平股票日内市上往来交易颇多，有二千余股，其价自八十五两起至一百十七两为止，日下则股价已至一百二十两”<sup>④②</sup>。可以说天津的开平股票市价受上海金融危机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开平煤矿在天津市场取得了巨大胜利。1883年12月，上海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开平股票一度下跌到每股50两，而天津的股票市场上却出现了认购开平股票热。“天津传信息云：开平煤矿股分票现价每股一百四十两，而人犹未肯出售，然则该矿务尚有蒸蒸日上之势也。”<sup>④③</sup>同月的《字林西报》也报道说“（天津）开平煤矿股票近日尚涨价不已，初四已涨至每股一百五十两，而尚无人出售，是该矿之好消息也”<sup>④④</sup>。天津开平股票市价日趋坚挺部分缓解了上海金融危机带来的资金周转紧张的压力，赢得喘息的机会。天津煤斤市场取得胜利，保证了开平煤矿正常产销，为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保证企业正常生产有助于开平煤矿度过资金周转不灵难关。

最后，唐廷枢一方面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另一方面支借适度官款缓和资金周转紧张给企业带来的压力。1884年唐廷枢进行企业内部整顿，“实力整顿，将冗人糜费一概裁去”，<sup>④⑤</sup>节省开支，提高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同年初，经开平矿局会办吴炽昌禀请、李鸿章和盛宣怀批准，开平煤矿得到20万两官方借款，年利率为6%。<sup>④⑥</sup>这笔借款是以开平煤矿负债能

力为前提,其结果不但没有损害开平煤矿的权益,反而缓解了煤矿资金不足的紧张局面。

从1883年秋到1888年,唐廷枢经过5年苦心经营终于度过了资金困难时期,不但治愈了上海金融危机所留下的“创伤”而且以销售煤斤所得断断续续清偿了所借官私各款。1888年所欠官款一度只有9,003两,全部负债减至91,040两<sup>④</sup>。张翼说:“照得开平矿务局,开办十有余年,并无官款,均系商办,”<sup>④</sup>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五年里,开平煤矿资金积累100万两,并于1888年第一次发放股息。

唐廷枢风风雨雨十年经营,初步解决了开平煤矿资金问题,为开平煤矿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社会上对唐廷枢经营成功反映强烈,“公(唐廷枢)之志遂一意于矿,通河道,开铁路,经营布置不遗余力,凡所以利益开矿者,靡不急起而立行,竭十年之心思才力,然规模焕然一新,而四方赖其利用者称道勿绝口”<sup>④</sup>。唐廷枢并没有因十年经营成功而停步,他利用开平煤矿的成功在商界的影响,迅速吸收私人投资,追加资本,扩大生产。1889年续招股325,600两,<sup>④</sup>私人投资达到150万两,再加上十几年的资金积累,成为开平煤矿资本组成的主体。总之,唐廷枢凭借他的闲熟的经营技巧、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以及他所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资金不足,为开平煤矿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成功表明一个真正企业家是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他的成功经验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

## 注释:

①④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第256页、179页

②《申报》,1882年8月12日。

③《字林沪报》,1883年1月22日,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01页。

④《申报》1882年6月13日

⑤《申报》1884年2月25日

⑦⑧郝延平:上引书,第139页。

⑨⑩⑪⑫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31页,第119页,第109页,第111页。

⑬《徐恩斋自叙年谱》,1927年版,第76—82页。

⑭⑮《申报》,1892年11月13日。

⑯《申报》,1882年3月28日。

⑰⑱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23页,第624页。

⑲王玺:《中英开平矿权交涉》,第29—30页。

⑳《申报》,1883年11月5日。

㉑㉒《申报》,1878年8月13日,1882年11月11日,

㉓㉔㉕孙毓棠:上引书,第641页,第642页,第662页,第666页。

㉖㉗㉘《申报》,1881年1月25日。

㉙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第119页。

㉚宜今室主人编:《皇朝经济文新编》第三册,第27页。

㉛㉜《申报》,1884年2月25日。

㉝刘广京:《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复旦学报》社科版,1983年3期,第94页。

㉞《申报》,1883年10月15日。

㉟《字林沪报》,1885年12月8日,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213页。

㊱㊲《申报》,1885年11月21日,1885年2月15日。

㊳开滦档案:M—0767/50,引自南开大学经济所编:《开平矿务报告》。

㊴《英领事报告》,1883年分(第3篇,第273—275页,天津)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654页;《捷报》,1885年6月5日,转引自《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第129页。

㊵㊶㊷㊸㊹《申报》,1883年10月23日,1883年10月27日,1883年12月5日,1883年12月11日,1884年8月19日,1892年11月13日。

㊺《(招商局档)抄件》,引自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926页。

㊻开滦档案:M—06736/19,引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开平矿务报告》。

㊼魏子初《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第3页。

㊽《捷报》,1889年9月21日,第356页,转引自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115页。

(上接22页) 周转,商交息银,称帑息。

坵课、盐折:福建称灶课为坵折。凡坵塌所纳钱粮,称坵课,由场官征收;盐田所纳钱粮谓盐折,由州县征收。

普育银:系拨充普济、普育两堂之经费,随同坵折正项征输,与地丁之耗羨相似。

贩引价银:福建滨海盐户办纳盐斤,初因赔累,折价过高,交商自行买盐配运,例名贩引,由州县课税,解缴道库。此项银两即称贩引价银。雍正元年裁商停引,此项银两被豁免。雍正五年,莆田场附海各灶户具呈情愿照旧完交,由莆田县征解道库,逐年汇同杂项造册奏报,系属盐务中之杂款钱粮。